

早年王国维与传统

——对三篇论文的分析

邓建华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提要:人们很少关注到,早年王国维在引进西学、醉心于康、叔哲学的历程与贡献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实践。通过对王国维早年的三篇文章的分析,可看出他在积极引介西学的同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所持有的态度是亲近而非疏离,对古代学术有亲切体认,并借鉴西法对其进行了有效而先进的梳理。在对外来文化敞开其体验与视野时,他的立足点还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主题词:早年王国维 传统 态度 实践

对于早年王国维接受西学的过程,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他的隐在意识层面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潜在制约*。但在谈到王国维在接受叔氏时期对传统的态度时,也就是他在接受西学时对传统的显意识层面,有学者认为,王国维“出于年青时代的激情”,对传统采取“疏远”的态度,而在其后期回归传统,又只是“因为生活在痛苦的环境和时代,可望而不可及的传统总给人以幻美——人们难以悟透这种虚妄(这里非指审美观念,而是指儒家理想的社会观念),即使是王国维这样相当深刻的理解了叔本华的人”^[1]。这一观点颇值得怀疑和商榷。首先,王国维在年青时代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疏离”的态度,果真如此么?这留待后文论证;其次,王国维后期学术转向,是为“传统”的“幻美”所迷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在接受西学之前他没有为这“幻美”所迷呢,而要发生在接受叔氏之后?

求证这些问题,最好的路径是分析早年王国维的著作。而他在接受、“崇信”(王攸欣语)叔本华时期(1903——1907),所作多是刊登在《教育世界》上的单篇文章。其中,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文章共十五篇,论先秦诸子及流派的共计十篇,论宋代儒者的计一篇,论清代学者的计一篇,另有三篇是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性、命、理)的。下面,我们将以写作时间

* 见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第3页、第100页。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思维方式,使得王国维在理解叔氏时未能“充分体验和理解(当然不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中与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说根本不同和差别很大的一些东西”,也就是异质文化的异质性。牛宏宝、张法、吴琼、吴伟《汉语语境中的中西方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14页、第115页。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趋势就是“以中国传统‘艺术心性论’会解西方美学”,“在接受西方观念或学说时……以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用所引进的思想文化的固有含义和逻辑来解释其本义……背后发挥作用的确是本土文化中的某个隐在的结构”。

[1] 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第258页。

为轴,对这三篇论文加以分析;在分析时兼及其他数篇。

《论性》(1904)篇,以康德的认识论为分析架构,对“性”这一古代诸子最具争议的范畴,甄定为“知识之材质”而“非知识之形式”,只能从经验上立论,并由此对上自周秦、下至宋明的历代诸子言性者,之所以不得不盘旋于善恶二元论所表现出的种种自相矛盾,从认识论角度作了透彻辨析;《释理》(1904)篇,以西方的“理由”、“理性”,与中国的“天理”作比较鉴定,考“理”之语源,察其变迁之迹,辨析其性质只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即仅有心理学上之意义,但在中国却演化成了形而上学及伦理意义上的“天理”;《原命》(1906)篇,则经由康德对意志自由说与定业论一属本体界,一属现象界的区分,对人的“自由”进行探讨,其批判对象主要是西方哲学中的宿命论、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而中国哲学中的宿命论与意志自由论,“亦不无因之明晰云尔”〔2〕,主张人的行为善恶只能在经验世界中进行考察。既不同于康、叔把自由置于抽象的本体世界,驳斥了古代哲学中的意志自由论与宿命论。仅这三篇论文,足以确立王国维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这几篇哲学论文以纯学术纯理论探讨的面貌出现,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们从哲学基础上考察并批驳了儒家纲常的理论依据,实则对孔孟以至程朱的儒家道德哲学、纲常观念,具有相当的冲击、破坏作用。他凭借西方的某种纯粹哲学、伦理学、名学(论理学)以及纯粹美学,对儒家伦理观念进行摧陷廓清的工作,所持为康、叔道德论的“哲学之依据”本身,如“纯粹理性”(通过“绝对的道德律令”的中介与德性联系)、先天意志(将德性与理性全然割断而一味诉诸非理性道德“直觉”)等等,也是脆弱的〔3〕。

这一评价恰恰印证了前面所提到的,王国维在年青时代对传统采取的是一种“疏离”的态度这个观点,但它却是必须加以辨析的。在此,它提示了王国维写作这三篇论文的一种思路:对儒家伦理观念摧陷廓清,进而冲击、破坏儒家的道德哲学、纲常观念。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并与之截然相反:对三个重要的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所进行的讨论是在落实某些东西,使所有讨论者(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的思路得到清理,找到讨论的真正落脚点。前者着眼于“破”(破坏),后者着眼于“立”(建设)。这两种思路,仅仅从三篇论文的孤立的阅读看,都有可能;联系与之相关的文章讨论,或可使问题更为明晰,以求得王国维思路延续的真实面貌。而在思路延续之间,文章的写作时序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们去探讨王国维对这几个概念的持续关注,以及这几篇文章的内在联系,故以下讨论皆标示出各篇目发表时间。

我们需加以讨论的文章,一是《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1904),一是《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以及《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一是《周濂溪之哲学说》(1906)。《国》文作于《论性》《释理》两篇的同年。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论述了戴震及阮元的哲学学说与贡献,也指出其矛盾之处。概言之,则为“由三代、秦、汉之说,以建设其心理学及伦理学……一方复活先秦之古学,一方又加以新解释”〔4〕,“以宋儒之说还之宋儒,以三代之说还之三代,而使吾人得认三代与唐、宋以后之说之所以异”〔5〕。其矛盾处则是“由戴氏

〔2〕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67页。

〔3〕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1页、第21页。

〔4〕 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第234页。

〔5〕 同上,第240页。

之说推之，则必欲之失根于知之失而后可，必私与蔽相因而后可……今乃曰：‘欲之失为私不为蔽’……不可谓之非矛盾也。”〔6〕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戴、阮二人的学说及研究方法给予王国维很大的启示，戴震论“性”与宋儒有很大差别，“故由宋儒之说，欲者，性以外之物，又义理者，欲以外之物也。戴氏则以欲在性中，而义理即在欲中”〔7〕。其学说对“存天理灭人欲”已有极大抨击；而其方法则为引用古书中关于“理”的辞条，考究其本义，同一方法也在阮元论“性”时使用过，这实际上是乾嘉考据学之发端，以许慎、郑玄为宗，以文字训诂阐发经义。王国维《释理》一篇所使用的主要也是这一方法。

《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有涉及宋明理学处：“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8〕。“能动之性质”在王国维对于学术及学术发展的评论中，应与“原创性”同义。不具有“能动之性质”的时代，是思维停滞的时代，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对于宋儒的学说及思考所持态度是欣赏的；他在刚才讨论的《国》一文论戴阮二人时有这样一句话：“其说之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9〕宋人学说的特点在他看来是“幽玄高妙”；《奏》文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于《易》之太极、《洪范》之五行、《周子》之无极，伊川、晦庵之理气等，每为历代学者研究之题目，足以见形而上学之需要之存在。……而中国之有此数人，其为历史上之光，宁他事所可比哉！”〔10〕

最有意思的是，在《周濂溪之哲学说》一文中，他称周濂溪“《太极图说》中，自‘无极而太极’以下，至‘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凡二百二十八字，是实伊洛关闽之渊源，太极性理之学之开拓者，而千古不磨之作也”〔11〕。尤其是这篇文章作于《论性》、《释理》两篇之后，就更引人玩味了。

在《论性》篇中，涉及周敦颐的评论是这样的：“周子之语，最为广漠。……然人之本体既善，则其动也何以有善恶之区别乎？周子未尝说明之。故其性善之论，实由其乐天之性质与尊崇道德之念出，而非有名学上之必然根据也。”〔12〕《周》文就周敦颐的《通书》阐述其哲学，在“本体论”部分讨论了他的性理论，明确的标示出本体之诸名目在性理论中所实际对应的，“诚”、“几之善恶”、“五德”等等，在“道义论”部分讨论的是“周子之伦理主义专在慎动”〔13〕。全篇为客观论述之语气，无一字穷究其学理的矛盾之处，毫无批判之意。如果认定王国维在《论性》《释理》两篇中的思路是“摧陷廓清”，那么，在这样的之后，还有什么必要去写文章论述周子的哲学体系呢？另外，《原命》与《周》文发表于同一年，如果说，王国维在写作《论性》《释理》两篇时的思路与两年后写作《周》时已发生改变，那么为什么在同一年，他会写出思路如此不同的两篇文章呢？如果坚持认为王国维所做的是摧毁、破坏的工作，则这些文章

〔6〕 同上，第239页。

〔7〕 同上，第236页。

〔8〕 同上，第36页。

〔9〕 同上，第234页。

〔10〕 同上，第70页。

〔11〕 同上，第229页。

〔12〕 同上，第248页。

〔13〕 同上，第233页。

之间则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裂痕,试想王国维对于哲学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竟会在自己的写作中出现如此矛盾,而未予注意和解释,那真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了。想到王国维在《静庵文集自序》中对其学习康德理论几经磨折的坦白记述,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中对自己思想上的矛盾的敏锐自查,则其文章中出现这样明显在学理上无法圆满之处,是根本不可能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王国维写作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三篇文章,其思路是“立”而非“破”,在1904年至1907年,他写作数篇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大多成于1904年后,《论性》三篇可视为对对中国古代哲学之成熟的理性思考,其后则是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整理。

在《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1906)一文开篇,王国维有这样的话:“汗德之《纯粹理性批评》使吾人陷于绝对之怀疑论……然遽谓汗德为怀疑论者则大不然……汗德之本旨决非有害于道德上之信仰及其超绝的对象(神)也。”^[14]王国维自身要在这三篇论文中做的工作,与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所做的工作是一致的,那就是:为知识划界,弄清楚什么是我们可以加以讨论的,什么是在我们理性范围以外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对叔本华有这样的评价:“后渐觉其有矛盾之处……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15]“叔本华由锐利之直观与深邃之研究,而证吾人之本质为意志,而其伦理学上之理想,则又在意志之寂灭。然意志之寂灭之可能与否,一不可解之疑问也。”^[16]这样的评价与其对周敦颐的评价何其相似!对于康德有关实践理性的自由的定义,也提出了疑问:“但自由之因果,与自然之因果,其性质异耳。然既有原因以决定之矣,则虽欲谓之自由,不可得也。……其为原因所决定,仍与自然界之事变无以异也。”^[17]同样,在《释理》篇中,王国维对西方哲学及伦理学中将“理性”与“德性”混为一谈,理性沾染上伦理学的色彩的现象,也进行了批驳。

由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在三篇论文中的思路,完全在于学理上的厘清。在他看来,宋儒哲学如世界上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学说一样,都自有其魅力,也有其瑕疵。在为其魅力所摄的同时,一个学者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学说中的薄弱之处,这才能取得一个全貌。也才能由此进行整理和发展。

另外,王国维对三范畴进行讨论与批判,另一深意,应在于为学术研究争取其独立性。王国维在其杂文中提到,“唐宋以前,孔子之一尊未定,道统之说未起,学者尚未有人主出奴之见也”^[18]。此后,宋明理学一直都是官方哲学,凡越出理学观点的都被视为违反正统的异端邪说,学术研究也只能囿于理学,窒碍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宋、元、明、清七、八百年间“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19]。以西方理论讨论这些重要的范畴,必然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激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摆脱政治对学术的钳制。

[14] 同上,第308页。

[15] 同上,第469页。

[16] 同上,第344页。

[17] 同上,第269页。

[18] 同上,第38页。

[19] 同上,第36页。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早年王国维对传统哲学范畴的思考辨证,源自他对传统的深切关注与了解,他的写作方式也有乾嘉考据之学的印痕:在《释理》一篇中,考察“理”字之语源,即借鉴了戴阮二人的方法,也即乾嘉考据法中的一种:考释文字的形体、音韵、假借的变化;另一方面,他的思考辨证也有助于传统自我的修正与发展。

说到三篇文章的理论依据,王国维立论所依恃的康、叔理论,其本身的确有难以圆满的地方。但正像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王国维从来没有回避这些问题,没有将理论神圣化,也没有因理论的瑕疵而弃之不顾。另外,运用一种理论作为自己的分析的凭依,只要理论与分析浑然一体而无勉强,理论对于论说即有益而无害,自古皆然;而无论何种严密圆满的理论,都会有疏漏脆弱之处,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则任何理论都无存在的理由,人类又如何进行思辨并求得进步呢?

显然,王国维在《论性》三篇的讨论之后必然的会遇到和康德所面临的同样的难题——道德与信仰的源泉何在。康德找到的是神,灵魂,上帝,他为信仰单独划出一块地盘;王国维却不能这样,因为上帝等概念本中国传统思想之所无,对此,他早有议论:“外国语中之无我国‘天’字之相当字,与我国语中之无‘God’之相当字无以异。”^[20]在他向哲学告别之时所说的“可爱者”与“可信”者的矛盾,可能早已潜藏在他的头脑中了,但这与他在这三篇论文中的写作思路,应该是两个问题了。只能分而辩之,而决不能混为一谈。

从前文所选取的文本中,可以看出:在接受叔本华哲学期间的王国维,非但没有疏离传统,对传统所作的学术贡献可谓大矣。对于中国古代哲学,他的体认是亲切的,他的疏理是有效的和先进的;对于西学的接受,反而有裨益于他对传统的认识,为他提供了比照的体系和学科的范式,以此为梳理我国固有之学的利器;西方的学术观对他也深有影响,他的对传统切中时弊的批评,较之时人盲目、不着边际的一味赞美,其对传统要更为关注与亲近。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外来文化敞开其体验与视野时,他的立足点还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他所希望的,是“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21],他所忧心的,是“吾国今日之学术界……庶可有发达之日欤?”^[22]早年王国维对传统既如此关注忧心,说他疏离传统,这种看法是否是由于对传统一词有所误解而产生的呢?传统一词,内涵丰富驳杂。王攸心单以“儒家理想的社会观念”代之,则对传统的理解太过片面与单薄。仅就学术言,无庸质疑,儒学是传统的主流,无论是要抨击传统,还是要张扬传统,论者多注目于儒学。但决不能将传统与儒学等同,儒学之外,有许多哲学派别;哲学之外,尚有文学,史学;且不论儒学内部,就有各种分支流派。如果注意到传统的丰富性,则早年王国维对传统的关注即是不证自明的了。

邓建华,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04级博士生。

[20] 同上,第47页。

[21] 同上,第5页。

[22] 同上,第39页。